

#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国际比较优势

谢晓娟 刘世昱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以物质力量为根基，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依托，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显现方式。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既具有本源优势，又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建设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问题上，既要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又要主动建构和增强这种优势，从而赢得更加强大的话语权，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意识形态 话语权 民主政治 制度优越性

**作者简介：**谢晓娟（1964-），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沈阳110036）；刘世昱（1986-），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抚顺市委党校讲师（辽宁沈阳110036）。

话语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语言符号，更是一种权力的工具。话语权是指人们通过话语而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政党、社会组织或团体等，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信仰进行传播，通过控制社会舆论，以影响和控制他人的意志和行为。话语权的实现既要以物质力量为根基，也要依靠民主政治的发展，更要通过先进文化来直接显现。我国积极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外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好面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为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内则是为了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 一、中国物质力量的增长是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基

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必须以物质基础为后盾。近年来，中国硬实力与日俱增，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西方国家而言较小，经济发展为世界脱贫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硬实力与日俱增。所谓“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具有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等可支配性力量。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马克思曾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

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sup>①</sup>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它以硬实力为基础，是硬实力的外在反映。可以说，就硬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而言，中国都有较快的发展。在经济方面，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约10%的增长速度，而且即使在世界经济普遍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仍保持6%以上，远高于全球2%至3%的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创新方面，近年来中国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技术、量子物理、医疗卫生、卫星导航技术等领域成就突出。约翰·科斯特洛说：“美国是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民用、军事信息革命的发源地……中国崛起成为量子及相关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将标志着创新中心向东方转移。”“一个不但拥有雄厚资金、而且正集中强大力量发展科技实力的国家（中国——引者注）正在冲击他们的地位。”<sup>②</sup> 在军事方面，我国不断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提升了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水平，增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由此可见，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的硬实力与日俱增，并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迅速发展的国家。硬实力的不断发展为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第二，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正不断缩小。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过着奢靡的生活而普通工人却如牲畜一般，造成这种严重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sup>③</sup>。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并使两者相对立，使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工人阶级劳而不获。那么，何时以及如何才能消灭贫富两极分化、消灭剥削和压迫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时候，贫富两极分化、剥削和压迫才能被消灭。今天的西方国家虽然通过社会福利、税收、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调整了分配方式，但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私有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依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正如有的英国学者所说，“土地和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加上关于遗产的法定制度，无论是慈善事业怎样把它人道主义化，无论保障全国生活最低标准政策的系统实施怎样限制着其中最恶劣的过分情况，结果必然地会把社会划分为两个永久的、大致上是世袭的阶级——即一个富人国和一个穷人国”<sup>④</sup>。西方国家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富豪统治和金钱政治，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侵蚀了公众利益、撕裂了社会，具有深刻的破坏性，其实质是维护富人阶层的利益，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比如，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② Louise Lucas and Emily Feng, Technology china reboots its superpower ambitions, *Financial Times*, March 22, 2017.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④ [英] 锡德尼·维伯、比阿特里斯·维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sup>①</sup>；再比如，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造成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经济疯狂发展，给俄罗斯的民众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发展步履维艰，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当前俄罗斯最富裕的10%的资产者拥有89%的全部家庭的财产<sup>②</sup>；德国在1995年至2015年间，收入最低的40%劳动人口的实质时薪减少了4%至7%，但收入最高的60%劳动人口同期时薪则增加了1%至10%不等<sup>③</sup>；而中国则不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又鼓励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调动人们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中国并没有出现西式的、不可逆转的贫富差距。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62，自2009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并创下自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基尼系数“七连降”表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呈逐步缩小态势，也表明政府在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中取得了一定成效<sup>④</sup>。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分化是由其无法克服的异化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造成的，只要这两点不改变，其贫富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而我国出现的贫富差距则是由于改革不彻底、不完善造成的，具有自愈性。

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人类脱贫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92年美国推行“华盛顿共识”以来，新自由主义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也导致世界范围内严重的两极分化。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市场极权主义造成了不发达国家的民众更加贫困和窘迫，因为它是为少数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资本的增殖，而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sup>⑤</sup>。中国的情况则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社会主义大国，为解决世界的贫困作出了较大贡献，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同时也是对“华盛顿共识”的颠覆和否定。从实践层面来看，“1950年至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今后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外帮扶……中国还解决了13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sup>⑥</sup>。2013年以来我国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精准扶贫”战略就是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大民生投入的前提下，减少贫困人口，实现7000万人口的脱贫目标。“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6066.7万人（截至2011年底为7582.5万人）……2016年全年支出城乡低保资金1702.4亿元（2011年为1327.6亿元）。”<sup>⑦</sup>自1981年以来，中国让8.53亿人脱离国际界定的贫困。社会主义国家的脱贫人数占到了全球脱贫人数的78%。与之相比，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仅仅实现了2.5亿人的脱贫<sup>⑧</sup>。中国解决世界贫困人口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体现了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① 参见《中美，谁的收入不均更严重？》，《环球时报》2017年2月15日。

② 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 <http://www.199it.com/archives/540605.html>.

③ 参见《报告：德国出现贫富悬殊现象》，《联合早报》2017年3月27日。

④ 参见罗兰：《基尼系数“七连降”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月20日。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⑥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⑦ 《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人民日报》2017年7月17日。

⑧ 参见〔英〕罗思义：《大饥荒与“华盛顿共识”的破产》，《环球时报》2017年3月10日。

## 二、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核心

今天的西方，政治乱象层出不穷，政治价值之魂的“普世价值”冥顽不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平稳发展，反腐败成效显著，政府的公信力明显提升，这些都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力量。

第一，西方政治乱象层出不穷。“西式民主”曾被一些人奉为圭臬，“西式民主制度”优越论和永世论也曾大行其道，但是自2010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难民危机愈演愈烈，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以英国“脱欧”为标志的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美国、法国、荷兰等国家总统大选中传统的政治家处于弱势，而主张逆全球化和反移民的极端右翼势力却大行其道。可以说，西方政治阵营已经陷入了“民粹主义和对抗政治的泥潭”，政治极端势力和民粹势力蔓延滋生，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泛滥，西方民众也越来越失去对自由社会及其基本价值观的信仰。西方国家陷入政治乱象的根源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政治和经济矛盾。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一切政治危机的根源，也就是说，在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的资本积聚日益严重，普通群众却日益赤贫，其政治只是有钱人的游戏。因此，政治的精英化和政治价值的大众化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使得资本主义的政治乱象层出不穷。

第二，西方政治价值之魂的“普世价值”冥顽不灵。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不遗余力地推广“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国家曾标榜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认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资本主义的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欧等西方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对其进行军事干预，欧盟国家以“保护的责任”为由冲在第一线。然而，美欧的干涉政策并没有给中东地区带来“民主曙光”，反而产生了始料未及的两大灾难：一是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离利比亚、叙利亚，通过非法途径涌入欧洲，强烈冲击欧洲社会，中东地区曾经的沙漠绿洲变成了教派和部族冲突的战场；二是中东持续动荡造成“伊斯兰极端势力”崛起，而“伊斯兰极端势力”则把恐怖袭击的目标对准了欧盟国家。西方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为在全球推行其自由市场体系张目，完全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美国在中东和北非赤裸裸地输出民主，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为了真正给中东和北非人民带来什么民主和自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sup>①</sup>可以说，“普世价值”是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价值观领域的诉求，它不是永恒的、超阶级、超历史的价值观，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而褪色。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优越于西式的民主。一是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其发展和完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403页。

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sup>①</sup>。社会主义民主代替资本主义民主，“这是民主在世界历史上空前地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sup>②</sup>。而资本主义民主是金钱的民主，金钱左右政治、左右民主，金钱决定一切权利，民主变成了金钱的婢女。资本对政治的控制，将会成为一场“政治私有化”的过程，导致民主的失落和扭曲。美国教育家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在于如下一点：它有系统地阻挠人民主权，使不利于自由权的经济依赖性的各种条件永久化。”<sup>③</sup>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的核心：金钱操控政治是美国华尔街大银行利用金钱收买政府的行为。二是中国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民主权利不平等的根源，把过去只有少数富人享有的权利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享有的普遍权利。毛泽东在1944年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提出“共享”的发展理念，而西方民主是“精英民主”，把民主政治的重心从公民转向少数政治家或大资本家。“三权分立”在现实中演变为大垄断财团、大金融机构、企业管理精英们权益分割的舞台，普通民众只是这一舞台游戏中的玩偶。三是中国的民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是对西方民主唯一性的打破。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民主的制度化形式既取决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也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人口素质、地理环境等因素，民主的具体形式都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也曾尝试过西式民主道路，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而且事实也证明只有通过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使国家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幸福，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西方的民主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并非民主的唯一模式。盲目崇拜和照搬西式民主不仅不会给其国家带来自由、平等、繁荣和发展，反而只会带来战争、危机和停滞。

第四，中国反腐败成效显著，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列宁曾指出，“贪污受贿”是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sup>④</sup>。习近平也强调，“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sup>⑤</sup>。可见，党的清正廉洁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员领导干部是中国的“关键少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者和践行者。党的清正廉洁事关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拥护和信赖，也事关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和价值理念的评判和认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反腐的力度和决心。2013年至2016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严肃了党的政治生态，加大了反腐力度，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和认同，党和政府的国内和国际的公信力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同比2013年是81%，2014年是88.4%，2015年是91.5%，2016

①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6页。

③ [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5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1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61-162页。

年是92.9%，逐年走高<sup>①</sup>。另外，在党风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政府的公信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使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信任度最高的政府。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对全球3.3万名民众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达76%，位列第一。全球的平均信任度水平从2016年的50%下降至2017年的47%<sup>②</sup>。也就是说，中国的反腐工作，大大纯洁了党的肌体，使党风和政风有了较大改进，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政党形象和政府形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上更具感召力。

### 三、中国的先进文化是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力支撑

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需要通过文化的渗透和感染而产生影响力和控制力。文化资源的优势是增强话语权的重要保证。我国有着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有着辉煌的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还有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这些都对提升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的世界依然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14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资本的剥削和掠夺本性的推动下，西方世界走上了技术至上之路。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不断改进劳动工具，发明创造了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数据技术等。现代化的实现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福利和便捷，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化却使人异化，人不过是工具的延伸，是生产机器的奴隶。工具理性成为人唯一崇尚的意识形态，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人们获得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善”和“美”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为了使人类“诗意”地生活，而是为了征服对方、支配自然、获得物质利益。但是，情感世界和意义世界是人类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人类需要心灵的慰藉和价值关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sup>③</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情理文化，它最具温暖心灵和情感慰藉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都带有温情脉脉的情感，这与西方的崇尚冒险、崇尚力量和崇尚征服的文化截然不同。可以说，在当前的西方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走出去，要与世界的现代化相衔接，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说：“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

① 参见《吴玉良：2016年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满意度达92.9%》，<http://fanfu.people.com.cn/n1/2017/0109/c64371-29009558.html>。

② 参见《全球政府信任度调查：中国第一》，《环球时报》2017年1月18日。

③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sup>①</sup> 近年来，从实践中也能够明显看到，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受到“热捧”。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孔子学院近年来呈不断发展势头，其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课堂，各类学员累计达916万人<sup>②</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大受欢迎，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使世界更加了解和尊重中国。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与时代的呼应中，在与现代化的协调中，不断彰显其文化魅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用“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故事”等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传播，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

第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较之当前的西方文化具有超越性。文化的先进与否体现的是价值观的先进与否，核心价值观是文化之轴，也是文化的灵魂，集中体现着文化的要义和特质，统摄着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当前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可以说，个人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层面上的追求，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物质因素即财产的私有制。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所促成的“人”的独立性是通过对他物的依赖以及一整套相应的社会制度来实现的，体现着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观念的诉求。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个人主义精神“尤其表现为一种观念，那就是个人有责任增长他自己的资本，并将资本增长视作最终目的”<sup>③</sup>成了宗教信仰的基础。可以说，个人主义体现的是“物化意识”，反映着物与物的关系之上的孤独。正是在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引起了资本主义的一次次经济危机和资产阶级国家发动的无数次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而当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内核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在于：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有机统一，它将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个体能够感受到精神上的认同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而个人主义则体现着个体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个人的利益高于社会整体的利益，体现着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后的根基是劳动，本质是共同富裕，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体现人民的主体性；而个人主义背后的根基是资本和私有制，本质是两极分化，最后的落脚点是“个人自由”，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性质。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观；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其宗教信仰密不可分，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使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与生俱来的种族优越感和使命感，它强调必须经过个人的努力，用成功和财富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认为自己负有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并救赎世界的使命。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打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幌子诋毁中国形象，叫嚣“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等。欧美的这种强势文化、侵略文化必然遭到世界人民的反感，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必然逐渐下降。

第三，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能够塑造中国人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形态和精神文化形态，它培育和涵养了红色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

①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② 参见《刘延东出席第十二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并致辞》，[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12/12/content\\_5246376.htm](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12/12/content_5246376.htm)。

③ [德]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6页。

神、抗震精神等。这些红色精神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民族精神。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加之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中华民族危机四伏、苦难深重，中国人民必须奋起革命，并能生存和发展。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有农民起义，也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些革命都没有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因此也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使中国真正地独立和解放，并形成了革命文化。可以说，革命文化自诞生伊始就是与抵御外辱和获得解放联系在一起，是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当中形成的，它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以及强烈的民族精神。虽然时代已经变迁，但是革命文化依然具有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些文化基因蕴藏在红色歌曲、红色文学作品、烈士陵园、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当中，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情感纽带，塑造着人们崇高的理想和引领着人们的高尚行为。但是不可否认，革命文化也遭到了西方的诋毁和非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妖魔化领袖和英雄形象、丑化中国形象等来否定中国的革命、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歪曲历史，其目的是想通过文化的虚无和否定来实现意识形态上的同化和颠覆。西方国家诋毁革命文化其实就是诋毁中华儿女抵御外敌入侵、艰苦奋斗的辉煌历史，是对西方列强侵略行径的掩饰。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地深入人心无疑是对其有力的回击。可以说，革命文化是近代以来，特别是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浴血奋战、英勇反帝、艰苦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进行艰苦卓绝奋斗的生动体现。因此，保护革命文化，唤醒人民心中的红色记忆，发扬革命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忘我精神、革命精神就是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

总之，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民主政治为支撑，以先进文化为显现。从国际范围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目的是宣示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以及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建立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其对于处在探索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道路和制度选择的启发性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美]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下），魏凤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2] [美] R. R. 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冷战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终结？》，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
- [3]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 [4] [美]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 [5]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 [6]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 [7] 鲁品越、王永章：《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兼论两种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 [8] 曹建文：《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审视与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编辑：刘影）